

编者按

本刊现开设专栏“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由近现代建筑史、城市史领域日本资深学者村松伸教授与国内青年学者赵齐合作撰写。专栏系列文章将回顾城市研究和城市史学发展的历史，探讨史学之于城市学科的意义。本文为系列文章的序篇。

导言：为何及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城市？

Preface : Why and How to Observe Cit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日]村松伸 | MURAMATSU Shin 赵齐 | ZHAO Qi

中图分类号：TU-984.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3)02-0004-02 DOI: 10.12285/jzs.20230414002

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 50%

大约在 2011 年初夏，一位中国记者突然打来电话，询问我对于中国城市化率超过了 50% 的看法。或许是因为当时我正在京都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主持大型科研项目“超大城市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所以他来联系我。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答的，当时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刚发生不久，我身心交瘁，无力分心思考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的意义。

然而，在日本国外，尤其在欧美国家，人们对于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非常关注。比如，知名的英国时政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在 2014 年 4 月刊的“Building the Dream”特集里对此进行了集中探讨，《自然》(*Nature*)也在 2014 年 5 月刊里以“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为题进行了论述。基于城市化率超过 50% 的情况，中国国务院于 2014 年 3 月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上述两组杂志文章都是对这一规划的回应，标题则源于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2 年首次提出的“中国梦”。两组文章认为，城市化固然会给中国带来种种课题和挑战，但中国将在克服、解决它们的过程中

进一步获得成长。

上述国务院颁布的规划和欧美的评论文章，让人联想到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1943—)的主张。斯蒂格利茨于 200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指出，21 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一是美国的高科技进步，一是中国的城市化^①。以城市化为基础的中国愿景，还可以追溯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与此同时，城市化率超过 50% 在中国城市研究学界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的顾朝林教授等学者总结了国内外针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指出城市化研究从 2005 年开始兴盛，这一结论正好是在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的时候提出的。

城市史学的四项目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大学攻读城市学专业，必然要学习中国城市史和世界城市史。然而，课本上介绍的是以城市形态为主题的知识 and 理论，和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的现实并无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化和城市史，即城市的现在和过去，

作者：

[日]村松伸，东京大学荣誉教授，城西国际大学特任教授；
赵齐（通讯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教授，东京大学协力研究员。
录用日期：2023-2

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由此，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连载文章，探讨这一错位是如何产生的，以助于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更好地建立联系。

正如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卡尔 (Edward Carr, 1892—1982) 在《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1961年) 中指出的，历史的意义在于与现在的对话。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城市史和城市史学史。我们的系列文章试图探讨城市史学的历史 (虽然有些拗口)，这个立意正是目睹着中国城市化率超过了 50% 而产生的，所以这一系列文章也是过去与现在对话的一个例子，因此，我们将专栏的总标题命名为“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的发展过程，能够与现在形成何种对话呢？在此，我们先阐明本文中几个关键概念。“过去”和“历史”不同，“过去”泛指之前的事物，“历史”是现在的人们对“过去”的一种梳理和叙述。“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更具有主观色彩。根据时间由远至近，“过去”可分为数个阶段，包括“遥远的过去”“较远的过去”“较近的过去”“瞬时的过去”，与之对应的“历史”是“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以及尚未完全成为“历史”的“准历史” (图 1)。

身处于现在的我们，通过与这些不同层面的“过去”建立对话，可以获得四种益处：一是教诲，即将过去发生的事物作为指导当下的经验或教训；二是溯因，即从过去追溯当前事物产生的缘由；三是共振，即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受到过去的人、事、物的触动，产生共鸣；四是继承和活用，即在当下继承并有效利用过去的事物。上述四类，是我们对于城市 and 建筑领域中，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所进行的对话类型的假设，也是这一系列文章的分析架构。比如，上述围绕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的研究和讨论，是将时间上溯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或 1978 年改革开放、历史地分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属于第二类“溯因”型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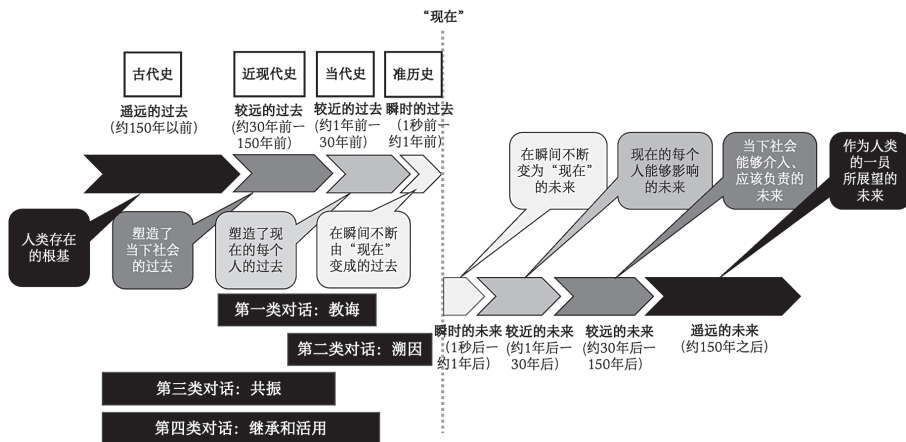


图 1：本文中对“过去”“历史”“未来”的定义和四种对话类型的对应图示

系列文章的结构和概要

从本文开始的一系列以城市史学史为主题的连载文章，将由我和我在东京大学的学生赵齐博士合作完成，在此向读者们简要介绍现阶段这一系列文章的整体构想。

紧接这篇序言之后，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以“近代城市研究的‘诞生’”为题。我们将考察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城市研究兴盛的契机，探究城市研究先驱者们的经历和他们对城市学科作出的贡献。这一考察包含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两类对话：一是从四位先驱者的角度而言，他们为了寻找城市中各种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对城市的现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属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第二类对话“溯因”，因为城市的现状正是由“瞬时的过去”构成的；二是对于 21 世纪的我们而言，这些先驱者的活动是“较近的过去”，我们通过考察他们的经历而获得“教诲”，属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第一类对话。

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将以“作为文明象征的城市史”为题。“城市是文明的象征”这一认知始于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第二篇文章将探讨这种认知的源头及后续的影响。这一类城市研究涵盖了目前世界上各国所进行的城市史研究以及世界遗产等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活动，是在“遥远的过

去”“较远的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的对话，属于上述四个对话类型中的第三类“共振”。

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将集中探讨“较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第一类对话，即以过去作为经验和学习的对象。第三篇计划以“作为智慧之源的城市研究之一：追寻乌托邦”为题，聚焦以乌托邦为主题的都市研究，第四篇则以“作为智慧之源的城市研究之二：探索微观尺度”为题，关注街区尺度的城市研究。

系列文章第五篇，将聚焦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规模的环境变化与城市的关系，对关注这一主题的城市史研究进行论述。

当前时代充满了变数，今后这些文章的走向或许也会改变，又或许会增加篇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与读者们一起享受在城市史学史领域探索的旅程。

注释

① 我们没有找到斯蒂格利茨这一“预言”最初的出处，但它被 2014 年的《经济人》特集等众多媒体引用。

图片来源

图 1：笔者自绘